

皮尔士溯因理论对翻译过程 TAPs 实证研究的反思

高 丽

(太原理工大学 外语学院, 太原 030000)

摘要: 从翻译研究前沿的翻译过程实证研究谈起, 在认识皮尔士哲学思想、溯因理论发展过程、溯因逻辑推理的基础上, 从皮尔士认识论角度探讨皮尔士溯因本能的假设生成过程和溯因推理的假设评估过程在翻译研究中的体现: 翻译单位的动态变化, 同一译者、同一文本使用的不同的主客观翻译单位, 翻译策略使用中去桎梏化策略与心理词汇提取过程体现溯因猜想和溯因推理的相融、交互的动态过程。同时对翻译过程实证研究的哲学严谨性、确定性真理观进行探讨, 呼吁用皮尔士理论对翻译过程进行反思, 以促成实证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关键词: 溯因; 猜想; 推理; 确定性; 翻译策略; 翻译单位

中图分类号: H 059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9-895X(2017)03-0223-07

DOI: 10.13256/j.cnki.jusst.sse.2017.03.005

Reflections on Translation Empirical Studies by Peirce's Abduction Theory

Gao Li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Taiyu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Taiyuan 030000,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Peirce's philosophical ideas and abduction theory,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translation process empirical studies from both philosophical and logical perspectives. Two factors are analyzed, i. e. the abduction instinct for proceeding of Hypothesis, and abduction reasoning for hypothesis evaluating process. It is concluded that translation units are dynamically used, even to the same translator and translation files, the 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units verified; translation strategy process are filled with the flexible combination of both abduction hypothesis and abduction reasoning. Meanwhile, the preciseness of the translation process empirical studies and corresponding philosophical criticisms, certainty of the conclusions and the truthful ideas are discussed. We propose enough attention to pragmatic theory of truth and further reflection on translation process empirical studies.

Keywords: abduction; instinct; reasoning; certainty; translation strategy; translation unit

翻译研究从研究对象角度分类, 可以分为“翻译结果导向研究”和“翻译过程导向研究”。传统翻译理论更加“结果导向”地关注前者, 近20年来翻译领域才开始关注对后者的研究。因为随着翻译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随着认知心理学、心

理语言学、神经语言学的发展, 人们越发意识到: 想要从本质上把握翻译内涵, 就要对翻译过程进行详细深刻的挖掘和剖析。

潘文国曾把翻译过程的实证研究称为翻译研究史上的“翻译过程”的转向^[1]。这一转向呈现了

收稿日期: 2016-07-14

作者简介: 高 丽 (1986-), 女, 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 翻译理论与实践、语言哲学。E-mail: gaoli050102@163.com

翻译研究的写实性和客观性,增强了翻译理论的描写力和说服力,确立了翻译研究的跨学科性质,促成了翻译研究的推进,进而成为前沿性的研究^[2]。正如 Toury 所述:把实证方法引入翻译研究是翻译学科进步的里程碑,翻译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正是发轫于新学科的研究模式和范式在这一领域的应用^[3]。

本文继翻译过程实证研究(《翻译过程中翻译策略和翻译单位的实证研究》^[4];《英语否定翻译过程 TAPs 个案研究》^[5])之后,从皮尔士认识论角度探讨皮尔士溯因本能的假设性生成过程和溯因推理的假设评估过程在翻译实证研究中的体现。

一、翻译过程实证研究

纵观 20 多年来国内外翻译过程实证研究,有声思维法^①(think aloud protocols)以其高效性、直白性、真实性、经济性等优点获得了翻译过程实证研究的半壁江山。

Krings 于 1986 年做出了第一例翻译个案研究——译者大脑中发生了什么。Lörscher 在 1986^[6]年与 1991 年^[7]分别用 TAPs 方法进行了较大规模的研究,48 名受试翻译了 52 篇译文,包括英语、德语互译,通过有声思维材料分析总结出不同的翻译策略。在其后的研究中^[8],主要考察翻译策略使用方面的分配与频率,发现职业译者比较注重语言意义,而非职业译者更注重语言形式。此外,两者在翻译单位的选择上和对目的文本总体监察上也有较大的区别。Jääskeläinen 发现在执行翻译策略的过程中,职业译员与非职业译员表现不同:职业译员在决定翻译总体策略后,一般都会在翻译过程中系统地执行这个策略,而非职业译员在运用翻译策略时缺少系统性,且随意性很强^[9]。

近年来,这类研究在我国关注度也逐年增加。郑冰寒、谭慧敏关注了英译汉过程的翻译单位研究^[10]:从主观翻译单位和客观翻译单位双重指标反映了不同水平译者的翻译表现。郑冰寒的《英译汉过程中的选择行为的实证研究》面世^[11];蔡寒松与郭嘉铨研究英语双重否定句的汉译过程^[12];之后蔡寒松又与刘葆婷研究英语因果关系句汉译的过程^[13]。在这两个翻译过程中,把不同水平的译者对元认知策略和认知策略的使用情况做了对比。

三、溯因理论^②统观

(一) 皮尔士——先驱之士

查尔斯·桑德斯·皮尔士(Charles Sanders Peirce, 1839—1914)在逻辑学、符号学、哲学、语言学、伦理学、科学哲学、计量经济学、实验心理学、美学等方面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而被尊为先驱鼻祖。他将哲学科学化,将逻辑数学化,在各个分支科学的研究中加强了其哲学理论精髓的严密性和通达性。“毫无疑问,他是 19 世纪末叶最有创见的伟人之一,当然是美国前所未有的伟大思想家。”^[14]皮尔士早年几乎读遍了所有的逻辑学著作,幼年时期对《纯粹理性批判》手不释卷,这为他之后提出溯因理论^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研读前人理论之后,结合自身经历形成思维范式,产生了自己独有的思想,对前人的理论进行修补和完善,最终形成自己先驱式的独创理论体系。

布拉格学派的创始人之一罗曼·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 1896—1982)继承了皮尔士符号学理论,将图像符号、指示符号、象征符号等的概念应用于翻译研究生成了翻译三分法:语内翻译(intranlingual translation)、语际翻译(interlingual translation)和符际翻译(intersemiotic translation),推动了翻译理论的符号转向,遂称皮尔士为“结构主义语言学真正的、大胆的先驱”^[15]。

在逻辑学领域,皮尔士将亚里士多德传统三段论的三个格加入自己的分析,提出了溯因推理,并将其纳入三种基本的推理形式与演绎推理、归纳推理相并列。这一理论长时间里没有得到人们的关注,后来美国科学哲学家 N. R. Hanson 全面展示和确切论证了溯因推理过程^[16],并进一步通过开普勒发现火星轨道和伽利略发现重力加速度来将这

① 有声思维亦称口语报告法,研究者给受试一则书面翻译任务,要求受试在完成任务时把大脑经历的即时思维用言语表达,研究者即时录音记录,最终整理称文本数据,以便分析归纳。

② 哲学家在争论溯因是推理的还是本能的,本文认为推理和本能是溯因的两个基本特征。如果这里称“溯因逻辑”会有溯因推理的倾向,所以暂称为“溯因理论”,也有人称为“一般知识获得体系”。

③ abduction 的中文翻译比较多,文献中报道的有:“引理、外展推理、假设推理、试推法、发想、设证、不确定推理、混合模态三段论、逆推、臆设、回思、回推、回顾推论、反证、还原、溯源、回溯等等;其中单单在语言学教学中的译名就有似真论证、直觉推理、不明推理、归演、溯因推理、回溯论证、含情论证。

一推理合理化。

(二) 皮尔士溯因理论的哲学溯源

翻译研究本质上是翻译的认识论问题,认识论问题说到底就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即主观精神如何实现对客观世界的认识问题。古希腊哲学关注客观对象,到近代哲学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从科学研究领域分析认识论的问题:一是对自然观现象进行观察的实验,一是对观察材料、实验结果进行数字处理、理性分析。在哲学分野中,将有前者倾向的理论称为“经验论”,将有后者倾向的理论称为“唯理论”。德国古典哲学在这个问题上有意识地强调主体的能动作用,进一步关注主体与客体的对立原则。

皮尔士受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的影响:在认识论问题上,康德强调“经验论”和“唯理论”。在同意一切知识都必须来源于经验的同时,又认为“对科学知识来说,仅有经验是不够的”。但是“我们如何先天地经验对象?”亦即康德认识论的根本问题“先天综合判断”,如何可能?自休谟对因果归纳原则的解构后,康德受到“日心说”的启发,把知识与对象的关系颠倒,让对象符合知识,知识就内容而言是经验的,就形成而言是先天的。这场“哥白尼式革命”就此证明了科学知识的普遍性,认为人的知性先天地具有一种综合统一感性材料的本源能力,它能自发地凭借其十二范畴统揉杂多材料而形成先天综合判断,从而建筑起人类科学知识的大厦^[17]。

皮尔士的溯因理论中,对“令人惊讶的事实”进行假设的依据是“猜测本能”。皮尔士说:“人故有种猜测本能,之后总从本性来取得正确的假设。”要获取知识,人脑天生就有一种猜测的本能:“人脑是自然的产物,即在自然进化中由来的。”因此在我们诉诸本能时,人脑通过同宇宙结构存在的感应关系达到正确猜测事物的效果,这是“宇宙所有奇迹中,最令人惊讶的一个”(CP: 8; 238)^④。

康德和皮尔士“调和”了唯理论与经验论,既避免了唯理论独断专横的“臭名”,也摆脱了经验论导致的不可知论的“深渊”,认为普遍必然性知识产生的前提是摆脱与生俱来的先验本能,康德称之为“认识形式”,皮尔士谓之“猜测本能”,这种“哥白尼式革命”为语言理论发展提供了理论源泉。乔姆斯基在此基础上提出的语言天赋观、语言习得机制、普遍语法等丰富并开拓了语言学理

论研究的视角^[19]。

(三) 溯因理论逻辑层面的完善

1. 溯因理论的概念内涵有逻辑学和语义学两个方面

溯因推理的逻辑形式是为充分条件假言命题的后件寻找充分条件,是演绎推理的逆推理。其逻辑形式如下:

$$\begin{array}{l} B \\ A \rightarrow B \\ \therefore A \end{array}$$

按照形式逻辑标准,显然犯了肯定后件的错误。溯因推理包含前后件引发的单项生成关系。相反,确定后件而与之没有因果关系的过程并不是溯因推理。例如:“地面很湿,刚才下过雨”由“刚下过雨”推出“地面很湿”符合引发与被引发的单项关系,而“地面湿”不是下过雨的理由,这种反推不成立,不属于溯因推理。所以溯因推理过程不仅包含有逻辑学推理的成分,还要纳入语义学因果关系的思考。

2. 最佳解释 (inference to the best explanation) 的动态推理过程

溯因推理是从多个假设中选择最佳解释的动态推理过程。如:医疗诊断中,医生从“咳嗽”的多个病因中结合多方面考虑选择一个最佳解释“感冒”。Lipton^[20]在其论述中体现了这一动态过程:

1 有理由认为 E_x 是真的

1.1 一个惊异的事件 C 为真

1.2 如果 $E_x = (x = 1, 2, 3, 4 \dots)$ 为真,则 C 是理所当然的

不同解释项 $E_1, E_2, E_3 \dots$ 有不同的解释力,最强解释力的则称为最佳解释, Lipton 称之为最佳解释推理。

3. 最佳解释的形成标准

(1) 经验性解释:

1 在 E 的所有解释中 X 是最佳解释

1.1 在过去的经验中, X 总是 (或最经常地) 导致 E_1 发生

(2) 创新性解释:

④ 此处按皮尔士文献标注惯例,标注符号和段落号: CP: 7; 192 表示 Charles Peirce 第7卷192段。

1 在 E 的所有解释中 X 是最佳解释

1.1 在过去的经验中, X 总是(或最经常地)导致 E_1 发生

1.2 X_1 和 X 有相似性, E_1 和 E 有相似性

创新性解释的形式是基于与其他解释结构的相似性,其逻辑基础就是类比推理:首先,个体对始源域中事件 C 映射到一个目标域中的相似事件 C' ;由于个体对目标域有丰富的认知经验,所以容易找到 C' 的原因 E' ,由于 E 发生时 C' 理所当然为真,故有理由猜想在始源域中对应于 E' 的解释 E 也可能是事件 C 的原因(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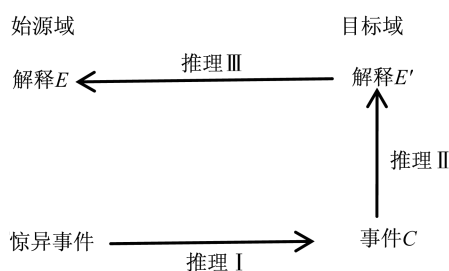


图1 最佳解释的创新解释

Fig. 1 New analysis for the best explain

四、溯因理论对翻译实证研究的分析

经过溯因理论哲学、逻辑层面的分析,可以得出溯因理论对解释翻译过程研究的得力优势:首先,溯因理论从猜测本能出发,而不囿于传统理论,更易于从人本主义视角站在译者主体性角色上分析翻译过程的线性行进路径;其次,溯因理论的开放性决定其实行的灵活性。本着经济性原则(economy of research),溯因理论在解释翻译过程思维行进路径时,选择最主要的考虑因素,同时寻求“最佳解释”(influence the best explain),是一个动态的推理过程。在此过程中,完整的思维活动还将演绎和归纳的基本推理过程纳入思维活动中:溯因形成前提假设;演绎推导翻译语句的意义;归纳验证翻译语句的正确与否。正是这些因素使得翻译过程研究灵活化、动态化,同时也更加复杂,进一步提高了此类研究的难度系数。最后,对于固定的某一译者来说,翻译能力的提升是译者将新习得内容完整融入已获平衡知识体系,从而达到另一种新平衡的动态过程。溯因理论在加重猜测本能关注度的同时,不放弃经验作用的探索,继而结合归纳、演绎推理,充分解释翻译过程中译者在各阶段、各部分翻译思维能力的表现方式和特点。

(一) 溯因推理与猜想跨度对翻译单位实证研究的宏观分析

人文社会科学由于夹杂了人的因素,其研究变得复杂化。综合考虑人文科学研究的精确性和可操作性,我们使用功能性解释的方法论,从整体通过反转方向、颠倒顺序来把握部分^[21]。通过这样的思路对人和研究对象的整体进行研究。翻译过程实证研究,即把译者和翻译过程作为整体进行研究,最终的结论均脱离不了对人在翻译过程中表现规律的描述。自然科学使用因果规律跟随时间流从过去的状态推知未来发展状态,是从已知推向未知的顺理成章的推理。以这种思路看功能性解释即用未来的未知推知过去。但在实践中,先形成整体概念结构,在此基础上形成整体框架对部分内容的理解和“猜想”。溯因推理正是基于此方法论而进行的。在翻译过程中,无数轮的溯因推理在动态循环往复地进行着。具体是哪个层面的溯因推理和猜想则通过翻译单位来体现。下面以郑冰寒、谭慧敏的实证研究^[12]结论来探讨。

同一篇文章,职业译者把握句以上单位的百分比大于翻译初学者,而初学者把握句以下的单位比率较职业译者大。可见不同水平的译者对翻译思维的熟悉程度和翻译必备知识的掌握水平不同。(Douglas Robison将译者应具备的知识分为行业知识、人本知识、社会交往知识、语言知识和文化知识^[22]。)进行溯因推理时,初学者对翻译活动的宏观感受较少,只能将注意点放在个别的字、词上,以其作为推理猜想的前提和质料进行一轮又一轮的溯因推理。职业译者遵从功能性解释的方法论,反转方向,颠倒顺序,从整体把握部分。

同一语言实体的翻译过程中,译者先后汇报不同的翻译单位。接到翻译任务后,译者先通读全篇,以语篇、句子为翻译单位,即主观翻译单位;在实际操作中,以细节问题的小句、词或词组为翻译单位,即客观翻译单位。在主观翻译单位的操作层面,译者结合自身形成的人本知识、文化知识经验,宏观猜想文段篇章的特定背景进行溯因猜想,并随着文段阅读的线性运行对猜想进行推理验证,完成文段阅读后形成初步的语义场建立;从客观翻译单位操作层面,在主观翻译单位操作的基础上,对特定的语言知识、术语、语法划分等细节问题需要做进一步的溯因猜想与证实、证伪,同时借助各种手段完成验证。这时,客观翻译单位即为较

小的词或词组。

综上, 不论是不同译者使用的不同翻译单位, 还是同一译者、同一文本使用的不同的主观翻译单位, 翻译单位的动态变化皆出于翻译实践操作过程中溯因猜想与溯因推理轮流交替的实践需要。溯因理论实行是翻译实践活动的基本行为特征。

(二) 溯因推理与猜想对翻译单位实证研究的微观分析

皮尔士前期视“溯因”为严格意义上的逻辑推理, 它与演绎、归纳相并列成为逻辑学的研究对象之一; 后期溯因把本能的成分纳入思考, 强调本能是溯因的一个重要因素。在具体进行翻译过程实

证研究时, 将交互、循环的动态过程简单化, 把溯因分为两个过程: 一是假设的生成过程, 在这个过程里, 猜测本能发挥了主要作用; 二是假设的评估过程, 这个过程在假设生成的基础上, 运用严密推理证实或证伪假设^[23]。下面以王树槐、徐敏的“翻译过程实证研究”^[24]为例。

去桎化策略^⑤: 去桎化策略结论中, 从逻辑推理和形象描述两个方面进行考察, 这一视角代表了典型翻译过程研究感性和理性两个方面的分析。原文对逻辑推理具体的考察有: 拆解、使用命题能力, 逻辑关系, 对应式、义理式译文产出能力; 对形象描述的考察有: 创造性、归敛性、两者平衡能力 (见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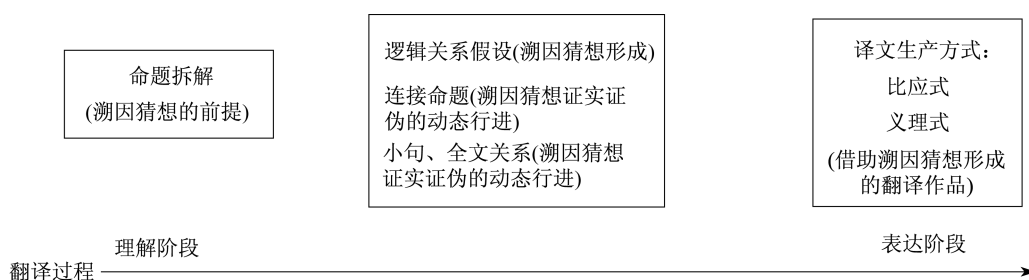


图2 去桎化策略的逻辑推理考察

Fig. 2 Logical reasoning investigation based on deverbalization

逻辑推理方面的考察中, 拆解使用命题是溯因猜想的前提, 为译者提供信息点。在此过程中, 面对零星的命题小句, 译者通过溯因猜想, 得出相应语义或逻辑关系的假设; 在连接命题小句, 产出译文的过程中, 溯因假设得到证实和证伪。

形象描述中, 译者通过文本碎片化信息, 构建亲身感受情节、情感的前提、质料, 在此情节中同时进行溯因猜想假设生成和溯因推理假设验证的往复过程。不论哪方面的能力的考察, 高分组受试者都可以更大程度地摆脱原文“束缚”, 结合自己的知识以及对相关文本的理解进行溯因猜测, 产生假设。译者把焦点投射在文本使用者身上, 将使用者的立场、场景加入思考范畴, 结合所有质料进行溯因猜想, 通过推理证实或证伪相关的假设 (见图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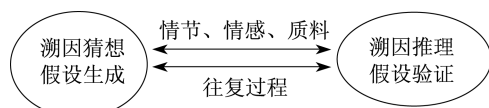


图3 去桎化策略的形象描述考察

Fig. 3 Experiential description investigation based on deverbalization

心理词汇的提取: 词汇水平的翻译也体现译者高低水平不一, 高低水平的操作分别称之为对应型^⑥和协调型^⑦。在确定词义的操作中, 完全意义上的对应型和协调型操作是不存在的, 总的操作步骤是先通过各种现有信息, 溯因猜想契合的原文情节或逻辑。对应型和协调型溯因猜想不同的关键在于, 溯因猜想过程中假设形成和评估所依赖的信息类别和操作的关注点不同。对应型的译者在溯因猜想阶段耗费精力较少, 倾向于词典帮助或其他现成的译法; 协调型的译者思维活跃度集中在溯因猜想阶段, 不受缚于既有译法, 提出更大范围的溯因假设选项。

其余在去除歧义、形意短路和提取遗漏方面的考察中, 译者均把大部分注意力投放在溯因假设验

⑤ 去桎化 (deverbalization) 指被试挣脱原文语言形式束缚, 充分融入语言框架 (frame) 所承载的心理场景 (scene), 然后用符合目的语逻辑规范或心理方式的框架再现场景的过程。

⑥ 对应型: 指直接从心理词库 (有时借助字典帮忙) 找到最通用的译词写上去, 不考虑语境的合适性或文体的要求。

⑦ 协调性: 指在理解意义之后, 不受缚于通用译词, 自己创造一个适合于语境和问题的译词。

证的推理阶段,高水平译者凭借严密的归纳、演绎及往复的溯因推理避免歧义、形意短路、提取遗漏等方面的失误。总之,译者在翻译过程实践操作时,每进行一次溯因猜想都遵循以下三个步骤(见图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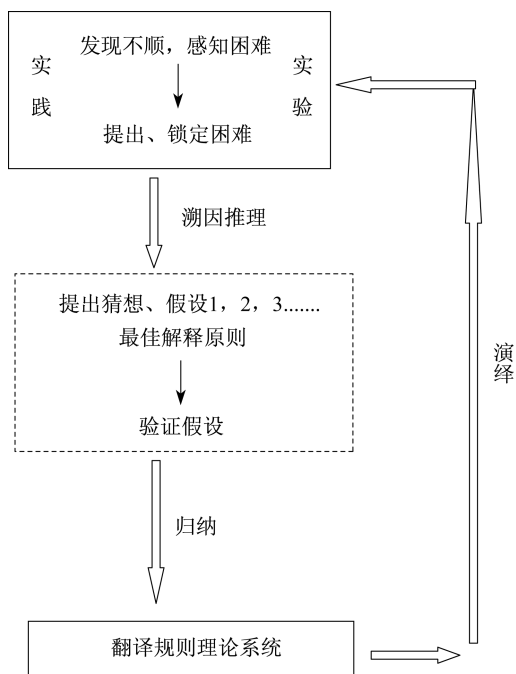


图4 溯因理论的翻译过程

Fig. 4 Translation process description based on abduction

(1) 困难发现阶段:面对翻译任务,译者在脑海中创设原文场景,在此基础上,当正常的“翻译流”遇到阻碍时,译者感知这种阻碍和困难,发现其中的不顺利,进而提出、锁定困难点。

(2) 困难解决阶段:面对锁定的困难点,译者凭借溯因猜测本能和掌握的一切质料提出所有可能的假设点,通过最佳解释原则最终验证、评估假设,再次进入原文场景,把特定假设点代入原文的系统,通过验证该假设点是否符合原文系统来证实或证伪该假设点;如果失败,则进入下一轮猜想和假设验证的过程。所以整个溯因猜想与验证过程是往复的、非单一的,溯因猜想得出的结论是或然的,需要经过一轮又一轮的严密验证。

(3) 译者翻译经验系统整合阶段:某个特定的翻译个案实践或实验结束后,这种过程体验即进入译者整体宏观翻译经验系统的意识流。译者通过此次实践或实验归纳反思得出自己的结论,或有甚者撰文升华结论,为整个翻译理论注入活水,更为后续的翻译实践打造更进一步意义上的完善规则理论系统。在实践中运用这些理论规则,系统演绎推

理,解决具体问题。所以译者长期的翻译经验积累是归纳、演绎、溯因推理综合作用的结果,离不开译者对原文材料及综合经验质料敏锐的观察力,也离不开译者溯因推理和猜想严密的逻辑思维能力,更离不开每次实践或实验之后的反思归纳。翻译活动综合考察译者多方面的素质水平。

五、翻译过程实证研究的再思考

翻译研究不可避免人文学科的多样化、不确定性的特点,需要天赋神权的唯理性因素来维持;实证研究是严谨精密的自然科学研究范式,二者结合的研究需要融合唯理论和经验论的双重因素。真理带给人们关于世界的确定性的认识,而这种确定性往往仅存在于理想化的模式状态中,它来自人的抽象能力,离开人类思维,确定性就无安身之地。对真理确定性的追求最早可以追溯到柏拉图。他把世界划分为现实的此岸世界和抽象思维的彼岸世界。怀特海曾评价说:“整个西方哲学史就是柏拉图哲学的注脚”这句话描述了柏拉图之后前仆后继的哲学家围绕真理确定性和理性是什么来提出自己的见解,而忽视了最根本的问题:真理存在吗?有必要在不确定的此岸世界追求不确定的彼岸世界的灵魂吗?于是我们结合翻译实证研究在真理的确定性和不确定性争执中进行反思。

(一)“幸存者偏差”

高水平译者如何界定?译者的社会地位、身份、考试分数、学习年限等只是带有概率性质的指标,他们译出高质量的译作是高概率事件,低水平译者译出高水平译作是“小概率事件”,但小概率事件并不意味着不发生。

高水平译者作为“幸存者存在偏差”的“受益者”,在翻译过程的正确行为更容易受到评判者的褒扬夸大,错误的或者欠妥的行为则又受到评判者“尽量宽容”的“优待”(尽管在有声思维实验中强调数据结论的客观性,这种心理倾向总是无法完全避免);反之,低水平译者作为“弱势”一方,总是处在受批判的地位,大有“以成败论英雄”的态势,遗憾的是,这种“成败”还不是严格标准下得出的结论。

(二)归纳推理的局限性

归纳推理是基于经验事实的,把接近关系和先后关系归为事物的恒常结合而成为因果关系。休谟

指出:归纳法体现的因果关系得来的经验不是理性,说到过去的经验,我们不能确认,它所给我们的直接的确定的报告,只限于我们所认识的哪些物象和认识发生的那几个时期,但是经验为什么可以扩展到将来,扩展到我们所建的仅仅在面貌上相似的别的问题^[25]。

(三) 类比推理

奎因^[26]曾把类比称为“外推”:把其他领域的规律知识投射到研究对象上,这种投射是否合理,得到的类比推理是否可信可靠?翻译过程研究受到了其他领域诸多理论“先入式”的影响而失去了其理论的“独立性”,基于此的实证研究也缺乏可靠性。

与皮尔士同属美国实用主义,并深受其影响的威廉·詹姆斯不同于传统的“真理符合学说”和“真理融贯学说”,从发生学角度提出实用主义真理观,真正关注真理的发生和接受过程。世界本质上是不确定的,我们最好面对这种不确定,利用本能天赋得出概率性的恒常性理论和规律来批判地指导未来实践。

六、结束语

翻译过程实证研究已推进到新的阶段,本文从逻辑学、哲学的皮尔士理论再次探讨翻译实证研究,提出翻译实证研究过程到结论合理性的证明,也从一些角度提出质疑、讨论,为翻译过程实证研究进一步发展提供参考,翻译过程实证研究的继续推进还有望专家学者继续思考,砖已抛出,玉当应声。

参考文献:

- [1] 潘文国. 翻译过程研究的重要成果——序郑冰寒《英译汉过程中选择行为的实证研究》[J]. 山东外语教学, 2012, 33(2): 90-92.
- [2] 苗菊. 西方翻译实证研究二十年(1986—2006)[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06(5): 45-48.
- [3] Toury G. 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Beyond[M].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1995.
- [4] 高丽. 翻译过程中翻译策略和翻译单位的实证研究[D]. 太原: 太原理工大学, 2013.
- [5] 高丽, 郭爱萍, 刘兰云. 英语否定翻译过程 TAPs 个案研究[J]. 沈阳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3, 15(6): 853-856.
- [6] Lörscher W. Linguistic aspects of translation process; toward an analysis of translation performance[J]. Tübingen: Gunter Narr, 1986, 31(1): 277-292.
- [7] Lörscher W. Translation performance, translation process and translation strategies: a psychological investigation[J]. A psycholinguistic investigation. Tübingen: Gunter Narr, 1993, 38(2): 353-355.
- [8] Lörscher W. A psycholinguistic analysis of translation processes[J]. Meta, 1996, 41(1): 26-32.
- [9] Jääskeläinen R. Investigating translation strategies[C] // Triirkkonen-Condit, Laffling J. Recent Trends on Empirical Translation Research. Joensuu: Faculty of Arts, 1993: 99-120.
- [10] 郑冰寒, 谭慧敏. 英译汉过程中翻译单位的实证研究[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07, 39(2): 145-154, 161.
- [11] 郑冰寒. 英译汉过程中选择行为的实证研究[M]. 济南: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2.
- [12] 蔡寒松, 郭嘉翎. 英语双重否定句汉译过程的心理学个案研究[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00(11): 8-10.
- [13] 蔡寒松, 刘葆婷. 英语因果关系汉译过程的心理学研究[J]. 外语研究, 2000(3): 32-38, 64.
- [14] 伯特兰·罗素. 西方的智慧[M]. 温锡增,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9.
- [15] 朱晓敏, 曾国秀. 皮尔士溯因推理与译者知识体系构建[J].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 2013, 35(10): 22-26.
- [16] Hanson N R. Patterns of Discovery: An Inquiry into the Conceptual Foundations of Science[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8: 85-89.
- [17] 康德. 未来形而上学导论[M]. 李秋零,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2.
- [18] Peirce C S. The Collected Papers of Charles Sanders Peirce[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31-1958.
- [19] 贺川生. 乔姆斯基语言天赋思想的皮尔士哲学根源: 溯因逻辑[J]. 当代语言学, 2004, 6(2): 122-138.
- [20] Lipton P. Inference to the Best Explanation[M].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04.
- [21] 陈友勋. 翻译中处理意义的研究方法探析[J]. 重庆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 29(6): 159-165.
- [22] Robison D. Becoming a Translator: An Introduction to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ranslation[M].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07.
- [23] 廖德明, 李佳源. 皮尔士的溯因之惑[J]. 自然辩证法研究, 2014(5): 20-25.
- [24] 王树槐, 徐敏. 翻译过程策略的实证研究[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12(3): 61-67.
- [25] 大卫·休谟. 人类理解研究[M]. 关文运,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2.
- [26] 奎因. 词语和对象[M]. 陈启伟, 朱悦, 张学广, 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

(编辑: 朱渭波)